

· 中医英译 ·

# 中药方剂名翻译策略趋势的实证研究

蒋建勇<sup>1</sup> 丁一芸<sup>2</sup> 朱明力<sup>3</sup> 陈嘉<sup>1</sup> 帅乾<sup>1</sup>

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数据,2000 年以来,约一千种中药以药品形式在国外成功注册。2009 年中药出口已达 14.6 亿美元。<sup>[1]</sup> 中药在海外的快速发展对中成药的翻译规范性提出了迫切的要求,以期确保近年来中药国际化的迅猛势头。然而学术界目前仍未形成统一的中成药方翻译样本。

2008 年 WHO 开始启动 ICTM(传统医学国际分类)项目。目前已经召开了四次国际会议。关于中药名称和方剂名称的翻译,基本达成共识,即采用音译,拉丁语仅作为辅助之用。<sup>[2]</sup> 面对这一建议,学界质疑之声不绝于耳。

子规半夜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笔者认为要建立中成药的药方英译模板,不能建立在理论假设的基础上,不能在外语语言学理论的纸堆里找出解决问题的良方,而须对当前国内外市场上中成药方的英文翻译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并总结规律,把握趋势,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才能有一定的优势地位。作为中成药方翻译趋势系列研究的一部分,本文立足方剂名翻译实证研究,提出一些观点以求抛砖引玉。

1 样本收集与分类整理 笔者通过实证收集、网络查询的方法,收集了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泰国、越南、日本、德国具有代表性的 305 份(其中大陆以外部分 233 份)中成药方英译本,在筛选的基础上建立中英文中成药方样本库,并归类整理成国内与海外部分中英文中成药方样本库(以下简称海外库)。

国内样本部分,如中医基本术语的问题一样,亦是百花争鸣。近期虽有统一趋势,但在关键词翻译,如性状、功能等缺乏统一;在方剂名、中药名的翻译策略上音译、英译和拉丁文的使用分歧明显。而且药厂在翻译策略上的统一性与企业形象关联性的认识差距不

小。目前市场上的中药说明书的翻译质量普遍不高,主要是翻译缺乏统一标准,表意不明确,可读性差。<sup>[3]</sup> 且对外交流史较短,因而国内样本只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作为中医药国际交流桥头堡的港澳台及东南亚地区,开埠百年来,一直处于与英文母语使用者持续不断交流的前沿。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来,一些药局反复更正、不断调整和统一其药方翻译策略以求规范,为使药品被英语母语使用者接受做出了艰苦卓越的尝试,使得其中成药方的英文翻译保持着较高水平。部分企业的药方翻译甚至体现出统一风格和形式,展示出极高的研究价值。马百良、永达堂等港澳台地区老字号就是其中典型代表。这些老字号的药方译本均体现出与国内截然不同的风格,从其方剂名到中药名的英译策略、格式均体现出译者和厂商的选择,也反映了它们在不断地外销实践中的经验总结,为海外样本库提供了丰富的中成药方英译研究样本。故而本研究更多地关注了上述地区和国家的实证,样本库中收录的海外库资料占总样本数量 80% 以上。

笔者将上述样本按翻译策略(英译、音译及拉丁文等翻译策略的使用)分类针对性研究方剂名的翻译策略,根据网络统计数据查询的使用频率,采用统计学分析手段以期量化确定符合中医药交流趋势的方剂名英译规范。

2 样本库分析结果(表 1) 费米尔在《普通翻译理论框架》(Framework for a General Translation Theory)中指出:“翻译目的决定翻译方法。”<sup>[4]</sup> 即翻译的目的不同,翻译时所采取的策略、方法也不同。反之在实践中反复运用的中成药名的翻译策略无一不体现出译者与受众之间妥协平衡,反映出翻译目的。黑格尔说“凡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即所谓的“存在即合理”。<sup>[5]</sup> 被译者反复实践的各种翻译策略包括英译与音译、加拉丁文注与英文解释、直译与意译甚至选词。长期实践形成的这些翻译策略以其现实合理性为我们留下了足够的研究空间,使得我们有可能从中找出符合未来方剂名翻译趋势的策略。

目前方剂名翻译主要体现出下列四种策略:拼音、

作者单位:1. 贵阳中医学院外语教学部专业英语教研室(贵阳 550002);2. 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北京 100029);3. 贵阳中医学院外语教学部(贵阳 550002)

通讯作者:蒋建勇, Tel: 13885070810, E-mail: dennis\_jiang01@163.com

英译、拼音(加注英译)、英译(加注拼音),从样本库数据来看,其中拼音(含汉语拼音、威妥玛式拼音法以及通用拼音)为主要方剂译名策略(通常含剂型,策略为英译;如 pill, powder 等)为 169 例,占海外库总量的 72.6%,在样本库总量比例也达到了 67.5%;这一策略在近年来产品方剂名翻译中成逐年上升趋势。英译策略占海外库 12.4%,总量约为 17.5%;另外两种策略实践的范例,统计数据表明其运用程度并不突出。实证表明在方剂名翻译策略上,实践选择了拼音为主流策略。

表 1 方剂名策略统计表 [n (%)]

策略	n	拼音	拼音 (加注英译)	英译 (加注拼音)	英译
海外地区数量总计	233	169(72.6%)	24(10.3%)	11(4.7%)	29(12.4%)
全库总量总计	305	206(67.5%)	30(9.8%)	16(5.2%)	53(17.5%)

中医译届近年来的理论分析似乎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结果。“我认为中医翻译的西医化必将抹煞中医概念的完整性和独立性,这才是贬低中医价值的做法。如“麻杏甘石汤”与其译成:“Ephedrea, Armeniaceaa Amarum Glycynhizae and Gypsum Fibrosum Decoction”,还不如干脆音译为“Maxing Shigan Decoction”……这种音译方法不仅保持了中医学特色,而且意思简单明了,现在许多国外出版的书刊药名翻译大多使用这种音译法。”<sup>[6]</sup>类似论述不少,理论研究颇多;但是如何解决音译导致的中医学信息实质性传递不强和音译能否被大众接受等焦点问题,提出的观点尽管不乏真知灼见,但常常或语焉不详,或仅为理论假设,因此信度较弱或影响不大。

对于这一问题争论之声时有出现,李毅提到“拼音译法简单草率,完全脱离翻译本质。拼音译法虽然简洁明了……但这种翻译所传递出来的信息量几乎为零……另一方面,消费者因无从了解药品从而不愿购买,也直接影响了中药的销售和在海外的推广”<sup>[7]</sup>这种说辞,所从者不少。阐释虽各有不同,但观点大多直指音译的致命弱点,他们正如 2004 年拙文中所批的“许多译者在音译的使用上却是顾虑重重,或害怕音译难以有效传递原文”<sup>[8]</sup>。因此笔者不得不试图从实践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害怕音译弊端,貌似有理;但就事实而言,这种假设本身就是伪命题。样本库音译法以占绝对优势的事实响亮地回答了这种一刀切式的担心,多余且无力!

语言学告诉我们:语言具有“文化传递性”。一种文化的东西总能以某种恰当的方式传递到另一种文化

中去。北京大学的孟华认为“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翻译具有传递‘相异性’的功能,即‘它可在一国的文化传统中,亦即在一个民族的身份认同中植入相异性因素’”<sup>[9]</sup>。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指出,翻译的功能之一就是在目标文化中塑造另一文化的形象(identity)<sup>[10]</sup>。这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传递常常以异化的形式突兀在交流之中,译者试图通过渐进式地交流,希望实现对异域文化的‘干预’。中医英译有史记载的近百年来,其输出到接受过程,无疑不体现出这种特点。从“*W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收录的“yin yang,”到“*世卫西太区标准(IST)*”中的“*mother qi(母气)*”,“*heart yin(心阴)*”,从“*国际针刺译名*”中的“*Sanjian(LI 3, 三间)*”,“*Triple Energizer Meridian of Hand-shaoyang(手少阳三焦经)*”,到“*世界中医药联合会(WFCMS)标准(ISTN)*”中的“*tuina*”,“*fu-organ*”,“*mingmen*”。上述翻译均基本已被母语使用者所接受,或出现在国际标准推荐的术语中。音译尽管被“尽量限制使用”<sup>[11]</sup>,但是仍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在中医外传的道路上,以无可争议的事实书写出夺目的华章。

人类的翻译史告诉我们,在这种对目标语的异化输入下,涌动的是不同文化的强烈对撞,对撞的结果往往是大量尝试成为历史的,但同时也会留下脚印。雨果曾评论道:“当你把一部译著献给一个国家时,那个国家几乎总是将这部译著视为对他的一种暴力行为”。<sup>[12]</sup>方剂名的音译趋势明显,正是这种碰撞或“暴力行为”的明证。海外的老牌中药企业,如位列香港十大百年老牌的“马百良”、“永达堂”等,在翻译方剂名时均明显实践了这种策略,如 *Ma Pak Leung Hou cho powder(马百良珠珀猴枣散)*, *Wentex Tong Lu Shen Wan(永达堂六神丸)*, *NIN JIOM PEI PA KOA(京都念慈庵密炼枇杷膏)*, *FENG SAI LING(牛头牌风湿灵)*,这些音译与大陆有所差别,无非是有的使用的威妥玛式拼音法或通用拼音罢了。海外库资料显示,这些药方的方剂名要么配有英译,要么在简介中给予说明,这些补充措施无疑为中药名内涵的交流提供了解决之道。“马百良”一百八十年的对外交流经验确立下来的方剂名翻译策略证明——音译无疑是能够被英语母语使用者接受的,这一点从其统一的方剂名翻译策略就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了。这些异化特征的强力植入,却在事实上让使用者在长期的接触中慢慢接受了这一策略。

但音译的方剂名应该采取怎样翻译策略实现异化植入呢,就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2007 年通过

的《中医基本名词中英对照国际标准》<sup>[13]</sup>明确指出：“方剂名采用双译法，每一个方剂词条后，均按顺序列出汉语拼音名及英译名”，“汉语拼音名基本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 年英文版)》汉语拼音方案，但采取了以中药名为单位，划分音节”。这一国际标准中提出的双译法无疑为具体解决方剂名的实用性、简洁性、文化传递性问题在理论上提出了解决办法。目前已有许多译者在实践中采用了这一办法，其排列顺序稍有不同，或拼音在前，或英译在前。

本项研究的海外样本库和总样本库中选用拼音策略以占绝对多数的事实也表明了这种趋势的优势地位。样本库显示拼音(加注英译)和英译(加注拼音)两种策略的比例在四种策略中排名第三、第四。两项合计为 15.0%。如果加上海外库倾向明显的纯拼音策略，使用或合并使用音译翻译中成药方的比例在海外库高达 87.6%，总数据库中也达到 83.5%。

综上，笔者认为从规范性角度来说世界中医药联合会的建议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模板，即拼音(英译)的办法来逐步解决问题。目前国内如云南白药(Yunnan Baiyao)均采用了这一办法。这种做法不仅有长期的历史实践基础，还解决了中医药方命名复杂性带来的翻译策略不统一的难题。而被广泛诟病的音译“译而不译”的弊端，海外广大厂商使用的英译附注或简要英文简介说明，无疑为我们提供了解决之道。

#### 参 考 文 献

- [1] 孟华,王茜.我国去年中药出口已达 14.6 亿美元[OL].  
<http://www.satcm.gov.cn/web2010/zhengwugong>

kai/xingyekuaixun/zhongyaochanye/ 2010 - 10 - 07/1188.html, 2010 - 8 - 10.

- [2] 王奎.中医药基本名词术语国际标准的研究进展[C]. 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 2012:94.
- [3] 罗海燕,施蕴中.论中药说明书的英译[J]. 内蒙古中医药, 2008, 9(18): 28 - 30.
- [4] Christiane N. Translation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M].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 Press of Foreign Languages, 2001:3.
- [5] 黑格尔.< 哲学原理 > 序言[M].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61:11.
- [6] 李照国.1995 和 1997 中国国家标准的英语翻译问题探讨[J].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报, 2010, 8(11): 1090 - 1095.
- [7] 李毅.中药名英译现状的分析与探讨[J]. 海峡药学, 2008, 20(4): 71 - 72.
- [8] 蒋建勇.中医英译中的音译现象与翻译的等值理论[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04, 24(8): 750 - 751.
- [9] 谢天振主编.翻译的理论结构与文化透视[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 188 - 201.
- [10] Venuti L. Transl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cultural identities[A]. In Schaffner and Kelly-Holmes ed. Cultural functions of translation [C]. Clevedon, Toronto and Adelaide: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1995:10.
- [11] 王奎.在首届中医翻译与出版编辑学术会议上的讲话[C]. 2010,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0, 14 - 16.
- [12] 王东风.一只看不见的手——论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纵[J]. 中国翻译, 2003, 10(5): 16 - 23.
- [13] 李振吉,王奎主编.中医基本名词中英对照国际标准[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8:3.

(收稿:2012 - 11 - 16 修回:2013 - 03 - 18)

欢 迎 投 稿 欢 迎 订 阅